



王轨作为王远知的高足，熟悉中古道教史的人对其并不算陌生。但王轨在道教史上的地位为晚出“茅山/上清宗师”谱系所掩盖，以至当下谈及王远知门下时常以潘师正、司马承祯为“正宗”，王轨的地位和影响力则被低估。¹ 尽管一些论著已对王轨作出简要讨论，² 但这些成果既未获得全面继承，更罕见有意义的推进。事实上，有关王轨的记载，虽有《仙鉴》《茅山志》等可资参考，³ 但最值得信赖者其实是他的墓碑。围绕这方墓碑，可对王轨道迹进行更可靠的考察。

❧ | 《王洪范碑》基本信息解析 | ❧

王轨碑全称《桐柏真人茅山华阳观王先生碑文并序》（王轨字洪范，后简称《王洪范碑》），《宝刻丛编》（卷15）、《宝刻类编》（卷2）等宋元以降金石著作屡有著录，又有陈垣录文可资参考。⁴ 陈垣引《重修玉晨观记》，接受此碑毁于嘉靖三年（1524）的说法。虽碑石无存，但《王洪范碑》因书法卓越而有宋拓传世。⁵ 据陈垣测量，此碑“拓本高五尺二寸，广二尺八存，三十八行，行六十九字，正书”⁶。碑文开头给出撰文、书丹者姓名：

散朝大夫行江宁县令于敬之撰

琅耶王玄宗书

此二人均为彼时重要人物。先来看撰文者江宁县令于敬之。唐代江宁县屡次改名，但在贞观九年至至德二年间（635~757）长期保持江宁之名。⁷ 郁贤皓依《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考于敬之出身洛阳于氏家族，“乃隋右翊卫大将军仲文侄孙。相州刺史敏直从兄弟”，可能于高宗时担任复州刺史一职。⁸ 撰写《王洪范碑》时，于敬之所任官职为江宁县令。沈文凡、孟祥娟在对唐代河南于氏文人的考察中称“又据其所撰王轨碑，应生活在玄宗、肃宗朝”，否定郁贤皓的观点。⁹ 然从《王洪范碑》中无论如何看不出于敬之为玄宗、肃宗时人的蛛丝马迹，沈、孟恐误读碑石。事实上，从《王洪范碑》内容可知此碑写于王轨逝世后不久：

谨命终南山万福观道士鞠元敬祁召先生□□□□辰，先生霞装奄俶。鞠法师痛征音之永隔，收蕤松涧；弟子祁行则、丁玄亮等，悲陟岵之长往，采绚芝岩，共勒丰碑，同甄盛烈。

这段文字既言明立碑缘起，又给出王轨晚年信息，对确定此碑撰成时间和补充王轨生平记述均非常重要。历代帝王常征召宗

◎
白照杰

《王洪范碑》与茅山道士王轨

华阳有道 勒铭丰碑

教领袖入宫讲学，宗奉老君为圣祖的唐代皇帝更不例外。鞠元敬奉命征召王轨，但抵达茅山时王轨已辞世。于是与王轨弟子祁行则、丁玄亮等制作墓碑以为纪念。根据碑文所述，王轨卒于乾封二年（667）十一月八日。鞠元敬奉命征召当在此前不久，获悉噩耗和为之立碑也当在同一背景之下。因此，当可确定此碑撰写和建造均在乾封二三年间。如是，则撰碑人于敬之也只能活跃于高宗统治前后，而不太可能在50年后玄宗时期依旧担任地方官职，更不可能是近百年后肃宗朝人物。《金石录》等材料著录《唐襄州孔子庙堂碑》，题为垂拱元年，亦为“于敬之撰”。¹⁰二者当为一人，可知于敬之至少在武后统治初年依旧在世，且可能任职襄州，并拥有一定文采。不难推测，于

敬之拥有地方长官和优秀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故鞠元敬等方会请其为王轨创作碑文。

书丹者王玄宗是著名道家人物。王玄宗是王绍宗（字承烈）的兄长，《新唐书》称他们是“梁左民尚书铨曾孙，系本琅邪，徙江都”。¹¹王绍宗少年家贫，但颇嗜书法，曾在僧坊为人写书维生。后通达，累进秘书少监等职。据信其书法造诣颇高，可与虞世南比肩。兄长王玄宗，“隐居嵩山，号太和先生，传黄老术”。¹²《新唐书》的记载过于简略，幸有《大唐中岳隐居太和先生琅耶王征君临终口授铭并序》（后简称《口授铭》）可补其阙。《口授铭》刻石登封老君洞南，系王玄宗临终口授遗言，王绍宗手书记录，后者还为之作《序》。由于王绍宗书法精湛，故此碑作为唐代书法精品获得重视，见诸多种金石著作，陈垣录文可资参考。¹³王绍宗在《序》中称，垂拱二年（686）四月四日，六兄王玄宗“见疾太渐”“侨居惠和里之官舍”。某日，王玄宗向七弟王绍宗交托丧葬安排，希望自然无为、一切从简。彼时“沛国桓先生道彦，亦在吾兄之侧”。桓道彦听闻王玄宗意见后，感慨“真率之理，道流所尚”。其后，“升真潘先生门徒，同族名大通，越中岳而来，自远问疾”。此处所谓“升真潘先生”当指潘师正。潘师正号“体玄”，“升真”是其师王远知的谥号。《授堂金石跋》认为“此称升真，蒙其师王远知号也”，¹⁴暂从其说。所谓“同族”，当指大通与王玄宗、绍宗同族。王大通得知王玄宗自主安排葬事后，请求归神嵩山中顶石室。潘师正生前修道嵩山，王大通称“曩者升真临终一令宅彼”，如能葬身其中，亦可与羽化不久的潘师



茅山道院三宫（九霄宫、元符宫、万寿宫）胜景



正接续友谊。王玄宗允可，要求随意选以青石，刊刻碑铭。接着，亲友根据王玄宗举止，“强号曰‘太和先生’”。王玄宗继而自述铭文，王绍宗依兄口授恭录之。王玄宗自称字承真，“本琅耶临沂人，晋丞相文献公十代孙。陈亡过江，先居冯翊，中徙江都”。王玄宗称自己55岁命终，望后人将之葬在嵩山“中顶旧居之石室”，认为伊洛之间乃“吾祖上宾之地”，得葬于此，“几不忘本也”。根据《口授铭》可知，《王洪范碑》中所谓“琅耶王玄宗”其实是王玄宗对自家郡望的追溯，他本人出生和早年生活的地方实际在江都（扬州）。《口授铭》的“沛国桓先生道彦”也非一般人物。泰山唐代《岱岳观碑》中的一段文字记载，圣历元年大弘道观观主桓道彦等，¹⁵奉敕在东岳设金篆斋河图大醮，“七日行道，两度投龙，遂感庆云三见。用斋醮物，奉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敬造等身老君像一躯并二真人夹侍”¹⁶。不难发现，以王玄宗为中心，串联起琅耶王氏、嵩山潘师正教团、东都弘道观等多个重要群体，反映出嵩洛道教内部交流的重要面相。然而，这样一位活跃于洛阳地区的道家人物，为何会成为《王洪范碑》书者？由于王玄宗相关记载不充分，《王洪范碑》也未给出相应信息，这一问题不易回答。但与王玄宗交好的潘师正是王轨同门，因此吉川忠夫所谓潘师正有可能在书碑一事上发挥中介作用的想法，便有其合理之处。¹⁷

最后，目前所见《王洪范碑》拓片和录文均为碑阳，但碑阴实际续刻其他内容。《宝刻丛编》记载，《唐华阳观主王轨碑》“后有总章二年，弟子李义廉题名《集古录目》”。¹⁸《宝刻类编》给

出类似记载。¹⁹ 碑石焚毁前编修的（至大）《金陵新志》也给出相应记载，称：“《桐柏王法师碑》……李义廉奉敕使还篆六字碑额。”²⁰ 这些记载过于简短，但最可能的解读是：李义廉此次是奉高宗敕命，返回茅山，开展对王轨的纪念活动，其间为王轨碑增补六字篆额。换言之，“李义廉奉敕使还”很可能是指王轨死后李义廉（随鞠元敬一同？）赴京城向高宗奏报消息，而后高宗令其返茅山致以哀荣。

从以上考察可以发现，王轨羽化引起朝廷和道教内部的重视。朝廷方面，不论是江宁地方还是李唐中央都对之表示哀悼；道教内部除王轨门下和奉敕前来的鞠元敬积极安排葬事，王轨同门潘师正和嵩洛地区的著名道教人士也参与其间，由此可略窥王轨在当时道教内外的重要影响力。唐高宗、使者鞠元敬、撰碑人县令于敬之、书丹者王玄宗、同门潘师正以及门下弟子等参与立碑纪念的各类人士，构成以王轨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

以《王洪范碑》为中心 展开的王轨生命历程

《王洪范碑》较详细地记载了王轨的传奇一生。碑文称王轨，“字洪范，一字道模，



琅耶临沂人”，卒于乾封二年，春秋八十八岁，则其约生于陈太建十二年（580）。碑文称王轨自曾祖以降，历朝任官。（见表1）

琅耶王氏是中古著名世家，王导、王羲之等均出自这一家族。然而，这里有关王轨世系的记载却并不属实，这一点详纠王筠和王铈关系便可知晓。王筠《梁书》有传，称其为琅耶临沂人，祖父王僧虔。王筠颇有文才，曾奉敕为昭明太子撰写哀册。大同五年（539）任太府卿，六年（540）迁度支尚书所述与《王洪范碑》所述相符。太清三年（549），贼夜攻其家，王筠坠井而亡，年六十九。²¹王铈，正史无传，但《王洪范碑》有关他仕途的记述却与王冲极其吻合。《陈书·王冲传》记载，王冲字长深，琅耶临沂人，祖王僧衍。王冲为梁武帝偏爱，年十八即出仕，“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出为招远将军”。梁敬帝绍泰中，“累迁左光禄大夫、上左右仆射……寻复领丹阳尹、南

徐州大中正，给扶”。梁陈禅代后，“解尹，以本官领左光禄大夫。未拜，改领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进、左光禄大夫”。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岁。²²不见经传的王铈与彪炳史册的王冲在时代和仕途上的吻合，不能视为巧合，更可能的解释是王冲就是王铈的原型，《王洪范碑》中王铈的荣耀经历是有意的张冠李戴。由于王铈并无传记传世，其与王筠是否有父子关系很难确定，但原型王冲显然不是王筠之子——王筠生于482年，王冲生于492年，二人只差10岁。王轨父亲王瑜，亦不见诸他处，但一者王瑜时代较近，二者碑文所述王瑜官职不高，或有一定可信度。

《王洪范碑》记载，王轨“年甫八岁，早丧所天”“属陈运告终，人身靡托”，乱世之下，王轨“萍流不定，蓬转无依”。依王轨生卒年计算，其8岁时正是陈后主祯明元年（587），次年杨广帅军来攻，来年陈朝覆灭。值陈朝没落之际而丧父，幼年王轨陷入困境。碑文记载，时幸有故人相帮，王轨被“携养寄诸包氏，一经憩庑，五载方离”。有关此包姓家庭目前几无所知，但王轨弟子中的一支却引人注意。《王洪范碑》给出王轨门下杰出弟子中有包方广，此人还见于陆长源所撰之《景昭大法师碑》。碑文称韦景昭“初法师事大法师包士荣，荣师事崇玄观道士包法整，整师事上士包方广，广师事华阳观道士王轨，轨师事升玄先生王远知，远知师事华阳隐居陶弘景”²³。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证明王轨门下这个包氏道士群体与收养王轨的包氏存在关系，但二者同宗亦不无可能。

《王洪范碑》称少年王轨对道教萌发兴趣，继而拜师王远知，人生轨迹出现转折。王远知是隋唐之际影响力最大的道教人物。²⁴寄养包家5年后，王轨投入王远知门下。《王洪范碑》对王轨拜师的记载时间逻辑有些缠杂。碑文指出，王远知是“一代伟人”，王轨“卜居茅谷，为香瓶弟子一十六年”，长伴王远知左右，接受道学熏陶。接着，“先生（王轨）爰及冠年，虔受经法”。事实上，所谓充当“香瓶弟子”16年，正是从冠年（20岁）开始计

曾祖	王筠	梁	散骑常侍、太府卿、度支尚书
大父	王铈	梁	简文帝太子洗马、招远将军
		陈	大中正，光禄大夫
父	王瑜	陈	著作佐郎、鄱阳国常侍

表1



算的。根据《王洪范碑》后文可知，大业十一年（615），王轨被炀帝指派任务，从此长期离开王远知。王轨 20 岁时正是公元 600 年，至大业十一年恰 16 年。从前述他寄养包家 5 年的情况上推，可知他在 15 岁时获包氏救济，则王轨 8 岁丧父后曾在自己家中生活 7 年。江旻所撰《唐国师升真先生王真人立观碑》（后简称《王法主碑》）称，王远知在开皇十二年（592）时，受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征召，勉强出山，后请还，杨广“遣使将送”于人迹罕至之山间修行。开皇十三年（593），据信王远知得天人劝说，大开法席，“山人著录三千许人，并立精舍，实为壮丽”²⁵。王轨拜师王远知正是此后不久的事情。《王法主碑》记载，王远知为“琅耶临沂人也”。近年发现的王远知后辈墓志同样自称出自琅耶王氏，雷闻对之进行考察，认为二者所述与《王法主碑》记载吻合，认为王远知“家族源出琅耶王氏未必是江旻的伪托”²⁶。《王洪范碑》中王轨三代祖先的记述有可能源自王轨本人生前自述。倘如此，则不论王轨是否真的出自琅耶王氏，他本人都自持琅耶王氏的身份认同。陈隋递代造成的社会混乱，或许为伪托氏族提供某种方便。同属琅耶王氏的身份，可能对王轨成为王远知亲密弟子起到一些帮助。《王洪范碑》记载，王轨“初在法主座下听《老子》《西升》《灵宝》《南华真人论》，退席之迹，即为人讲说，五行俱览，一字无遗”。王远知感慨：“吾道东矣，何独康成！”王远知此语使用了郑玄（字康成）的典故。²⁷

《王洪范碑》接着记载，王远知受隋朝皇帝征召，王轨“从游京洛”。对比《王法主碑》的记载可知，王远知至少两次受杨广征召，²⁸此征召当系大业七年（611）的那一次。《王法主碑》和《王洪范碑》分别记载相关情况，可互相补充：

大业七年，炀帝遣散骑员外郎崔凤贲敕书迎请，鉴于涿郡之临朔宫。……六军返幡，扈驾洛阳，奉教于中岳修斋仪。（《王

法主碑》）

王法主……追赴东都。先生此辰，从游京洛。……当时奉敕玉清玄坛行道……随后主簿伐玄兔，先生扈从黄龙，车驾凯旋，陪还洛邑。大业十一年，有诏特委先生于河南廿四郡博访缙素、有道术异能、杂技德行、讲说灼然、堪供养者，及精通兵法之徒，并具状追送驾所。（《王洪范碑》）

大业七年至十年，正值炀帝三征高句丽，王轨与师傅一同见证这一事件。《王洪范碑》的记载在时间线索上依旧有些混乱。玉清玄坛（或者玉清观）是王远知长期居住的一所道观，雷闻指出，茅山太平观虽为王远知所建，但王远知去世时太平观刚刚动工。在更早的诏令中，王远知一直被冠以“玉清观道士”之名。²⁹有关玉清玄坛建于何时何地，分别有两种说法。（见表 2）

相对严谨的史料均将玉清玄坛的地址放在东都洛阳，且将建造时间放在大业七年之

时间		地点	
1. 炀帝继位，崔凤贲为使，双方临朔宫相会后。	《真系》（见《云笈七签》卷 5）	1. 东都	《旧唐书》192 《太平御览》卷 726
	《旧唐书》卷 192 《太平御览》卷 726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 64		
2. 晋王镇扬州时	《谭斌录》（见《太平广记》卷 22）	2. 江都	《谭斌录》（见《太平广记》卷 22）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 64

表 2

后。潜在意义即，玉清玄坛是为安置王远知一行而建，只有当王远知定居洛阳时才有建造必要。如此，则王轨不可能先“奉敕在玉清玄坛行道”，再“扈从黄龙”；而只能是如《王法主碑》记载，先赴涿郡与炀帝相会，³⁰而后返回洛阳入住玉清观。鉴于《王洪范碑》前文也存在时间线索混淆的情况，而《王法主碑》撰刻时王轨仍然在世并参与此碑营造，故当以《王法主碑》为准来清理时间线索。“返还洛阳”和“玉清行道”的顺序已可确定，但王远知和王轨到底何时返回洛阳呢？吉川忠夫和雷闻认为第一次征辽失败后，炀帝于大业八年（612）七月班师，九月抵达洛阳，此时王远知等一同归来，从此流寓东都20余年。³¹但似乎并没有材料支持或否定这一说法。然而无论如何，最晚大业十年（614），二人也已能够“奉敕在玉清玄坛行道”。

根据上引《王洪范碑》文字可知，高丽战争结束后不久，王轨被委任外出河南二十四郡，寻访异人。王轨“以兹衔名，言归旧庐”，期间隋末混战爆发，以致“关河路绝，因即避乱名山，遂历天台、赤城、四明、桐柏、金庭、蔡隩、缙云、若邪”“日月居诸，复淹十载，

而黔黎涂炭，县命有归”。避难天台的10年里，王轨与王远知失去联系。彼时王远知脱离杨隋集团，投身李唐政权，在李唐创业战争中辅佐李世民等人，为后者树立道教信仰上的统治合法性，从而在道教与李氏家族之间建起桥梁。据《王洪范碑》记载，随着李唐政权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江南社会逐渐稳定，王轨“背天台，还地肺，入轩辕而法驾，游郟鄏而谒真人”。地肺自然是指茅山，“轩辕”据信活跃于河南一带，“郟鄏”是洛阳的古地名。这段文字显示，王轨离开天台后首先回到茅山，继而转赴洛阳拜见王远知，师徒二人终于团聚。在洛阳与师傅相会后，王轨被委以重建许陶旧观的任务，率先返回茅山。《王洪范碑》对此事记载较为详细：

于时法主上承恩梓泽，未果言之柳沂，故遣法师先还，修葺许陶遗址。此观梁武皇帝于许真人旧宅为陶隐居建立，号曰朱阳。皇明启运，更以华阳为目。……而旧基夷漫，余迹沦芜，先生更剪棘开场，肇兹崇构。敬造正殿三间，两庑并及讲堂、坛靖、房宇、门廊……又于殿内奉造元始天尊像一躯，光跃丈八。左右真人夹侍，神仪肃穆，法相希微。

据引文所述，新修华阳观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其与上清派传统权威人物相联系，对此道观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对传统的自觉归附。吉川忠夫对王轨建华阳观的问题有所涉及，认为《王洪范碑》中记载的奉造元始天尊和左右真人，就是江旻所撰《王法主碑》里的“又于内殿奉为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一躯，二真夹侍”³²。但这里可能存在误会，《王法主碑》所记载的三尊神像建于太平观中，王轨所建神像则是在华阳观里，二者并不相同。王轨所造之像仅称“奉为”，造像原因不详。但文德皇后卒后，朝廷令茅山太平和华阳等观均造天尊、真人像为皇后追福，也很有可能。换言之，尽管是两处造像，但却可能拥有同样的造立背景。

与前半生犹如转蓬相比，王轨中年开始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王洪范碑》记载其晚年的一些活动：

法师住于名山福地，感遇真经，晚居华阳，又摹写上清尊法、洞玄洞神符图秘宝，并竭钟卫之楷模，尽斑倕之剡削，緘封静室，永镇山门。先生自幼及长，恒味松木。平生斋讲传授，所有信施，并入功德，赙救贫无。

碑文盛赞王轨的书法造诣，其手书大量道经“永镇山门”，使华阳观拥有一批固定经宝。修炼方面，碑铭称王轨善服术等，



传世王洪范碑帖首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



王家葵认为这是王远知师门中一向坚持的修道方式。³³以斋讲所得法信施舍来救度贫困，显示出王轨慈善济人的一面。接着，时间来到乾封二年。十一月一日朝礼之后，王轨对弟子称前夜梦见三位仙人来召，“告云华阳天宫，素已品藻，用师为神仙万人主者，兼知领校省官”。王轨称，此前避难桐柏山就曾有此梦，今次势在必行。于是向弟子交托各类事务。八日香汤沐浴，九日从容而化，春秋八十八岁。十七日，葬于陶弘景墓旁。或许正是因为与桐柏山有此因缘，王轨才被会冠以“桐柏真人”的名号。大约就在此时，开篇提及终南山万福观道士鞠元敬奉诏至茅山征王轨入京，但终于缘吝一面，只得与祁行则、丁玄亮等人一同主持立碑事宜。《王洪范碑》序文最后，称王轨弟子千余，其中戴慧恭、包方广、吴德伟、王元晔最为杰出，同样参与立碑。两年后，李义廉等奉高宗敕令展开新一轮纪念活动，为《王洪范碑》补撰六字碑额，并刻名碑阴。

✿ | 小 结 | ✿

以上考察了《王洪范碑》和王轨的生平，通过对碑石情况和碑文记述的双重考索，王轨的大致情况目前已较为清晰。有关唐

代茅山道教的研究历来重视王远知的历史作用。就影响层面而言，王远知与朝廷之间的密切互动当然是茅山道教能够走向兴盛的重要原因。但王远知本人直到去世当年方返回茅山，茅山道观的重建工作实际是由王轨等弟子操刀，这些人的经历同样值得关注。

将王轨放入恰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理解后，对其生平的考索便不止步于考证本身，而是能够从他身上发现大变迁时代里一位道士的现实人生。王轨少年逢乱世、丧父而生活不幸，投师王远知使王轨步入社会上层圈子，但当混战爆发时王轨却选择避难天台10年之久。唯李唐鼎革后，方回归茅山，重获安宁，继而发挥自我价值，在临终前获得皇帝征召的殊荣。与师父王远知一向高调的人生不同，王轨的经历充满起伏，他本人似乎也更倾向以自然无为的态度来面对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家国巨变的时代里，像王远知这样积极地与不同政权建立联系的道士毕竟不是多数，诸如王轨的“有道则显，无道则隐”或许更有代表性。☯

（作者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

1. 有关唐代茅山道教的研究数以百计,但王轨的作用往往遭到忽视。这一问题与王轨没有进入《茅山志》的“茅山宗师”谱系存在一定关联,但唐代的“上清道”教团身份和传承谱系,实际是司马承祯、李含光时代才开始出现的社会认识。有关唐代茅山道教的大致情况,除一般道教史著作外,可参考Edward H. Schafer, *Mao Shan in T'ang Times* (Second Edition; Boulder, Colorad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1989); 汤其领:《唐代茅山道论略》,《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31~34页。
2.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册,第125~126页;吉川忠夫:《王远知传》,《东方学报》1990年第62号,第84~86页。
3. 刘大彬编,江永年增补,王岗点校:《茅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9,第155页。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5,见《道藏》,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册,第245页。
4. 6. 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8~60、58页。本文所引《王洪范碑》文字均于此,唯标点时有修订,后不出注。
5. 《王轨碑》被视为唐代小楷经典,为历代书家所重,得以碑帖形式保存至今。碑帖例见《唐王洪范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7.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25,第594页。
8.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卷194,第2650页。
9. 沈文凡、孟祥娟:《唐代河南于氏家族文学辑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第79~80页。
10. 赵明诚:《宋本金石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卷4,第93页。又见《宝刻丛编》卷3、《六艺之一录》卷25等。
11. 1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199,第5688页。
13.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71~72页。本文所引《口授铭并序》文字均出于此,后不出注。
14. 见王昶:《金石萃编》,卷60,收《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年,第2册,第1027页。
15. 桓道彦此时应是刚任弘道观观主。据《宋高僧传》和《佛祖统纪》记载,杜义在万岁通天元年前担任弘道观观主,当年反出道门,皈依佛教,此后桓道彦方才可能继任观主。见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17,第414页;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40,第696页。
16. 《岱岳观记》录文及金石跋文,见王昶:《金石萃编》,卷53,收《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册,第888~903页。
17. 32. 吉川忠夫:《王远知传》,第84、86页。
18. 陈思:《宝刻丛编》,卷15,《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第18327页。题名误“轨”为“乾”。
19. 《宝刻类编》,《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卷2,第18421b页。
20. 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12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2册,第486a页。
21.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37,第484~487页。
22. 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17,第235~236页。
23.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65~166页。
24. 有关王远知的海内外研究成果回顾,参雷闻:《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以新刊唐代墓志为中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第139~152页。
25. 江旻:《唐国师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观碑》,收陈垣:《道家金石略》,第51~54页。本文所引《王法主碑》均出此书,后不再出注。
26. 有关讨论,见雷闻:《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第139~152页;引文,见第150页。
27.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卷35,第1207页。
28. 王远知与隋炀帝交往,参王光照:《隋炀帝与茅山宗》,《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第74~79、97页。
29. 雷闻:《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第143页注5。
30. 有关临朔宫,见吉川忠夫:《王远知传》,第82页。
31. 吉川忠夫:《王远知传》,第82页;雷闻:《茅山宗师王远知的家族谱系》,第144页。
33. 王家葵:《王洪范碑所见茅山道教饵术传统》,收其《石头的心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7~49页。